

·学术方阵·

网络文化的伦理特征

王怀诗 胡文静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 文章论述了网络文化呈现出的五大伦理特征,即伦理环境的网络化、伦理观念的大众化、伦理实践的商业化、伦理主体的虚拟化、伦理意识的双重性等;据此提出了解决网络文化伦理问题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 网络文化 网络伦理 伦理特征

中图分类号: B82-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3-0058-05

Preliminary Probing into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eb Culture

Wang Huaishi Hu Wenj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Discoursing upon five important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b culture is taking on, viz. cyberizing of ethical environment, popularization of ethical concept, commercialization of ethical practice, virtualization of ethical subject, duality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oposing some fundamental thoughts scenarios to solve the ethical questions and perplexities of web culture hereby.

Key words: electronic culture; ethics of web; characteristics of ethics

CLC number: B82-057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3-0058-05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Internet 在美国由军用转为民用以来,尽管只有短短的 20 多年的历史,但业已成为影响最大的一场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网络文化以数字信号为记录方式,以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等为存贮和传播媒体,以开放性、分散性、虚拟性、图像化、交互性、快速复制和传播为基本特征,各类数字化的书刊、音像资料、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等是网络文化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声频、视频、动画、图像等元素或这些元素特定的组合以及多媒体技术的综合运用,是网络文化生成、传播和发展的基本过程。作为一种文化运动,网络文化已经深入影响到哲学和美学观念、思维与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促使一些理论家们提出全新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话语。^[1]

从伦理特征的角度审视网络文化,是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和文化转型的社会影响;有助于全面认识民族传统文化伦理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文化伦理的关系;有助

于构建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社会与整个和谐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环境和伦理生态。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的伦理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1 伦理环境的网络化:网络伦理的出现

在传统文化中,信息无论在类型、数量、传播范围上还是在社会作用上都是比较有限的,总体上是稀缺的,人类主要生活在现实平台上,而与之相关的伦理问题也多是潜在的。而在网络文化中,信息的增长却快得惊人,信息内容的复杂性和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大大增加,人类信息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也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人类更多地寄居在自己建立的网络世界之中。人们的各种行为似乎都与比特(Bits)、节点(Nodes)和链路(Links)息息相关。这种前所未有的状况必然导致人类伦理环境本质上的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

实际上,人类文明越是发展,人类就越是脱离某种具体关系的束缚,而更多地陷入到种种抽象的信息关系之中。鲍德里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伦理及其社会调控机制研究”(05CTQ006)的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07-01-30;责任编辑:王景发

亚·利奥塔、德勒兹等后现代学者采用“内爆”、“媒介异体”等概念,从信息、传媒和技术的角度提出,当今世界是一个由“符号”和“超现实”、“仿真”与“类象”、传媒与信息、科学与新技术共同构成的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受控于代码的数字逻辑的社会。^[2]在这样的社会中,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和和行为似乎到了穷途末路。例如,在网络空间中,人们是通过键盘、鼠标、显示器、网页等与他人打交道的,他们所面对的是无形的信息世界,现实的交往规则被搁置,传统的理性、道德甚至法律等规约也不再起重要作用。

由此看来,在“数字地球”和“数字化生存”展现的语境下,国家和个体都成了网络环境中的一个文化符号。因为网络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平台,它总是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伦理内容;尤其是网络传媒还担负着确立社会新型伦理框架的责任与义务。这样一来,网络环境的变化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到人类的文化伦理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传统伦理的消解与新型伦理的缺失极易诱发“信息焦虑”、“信息崇拜”、“信息陶醉”、“信息异化”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在流质状态中不稳定地凝聚着的网络文化,更容易导致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思潮的泛滥,从而使人们在伦理观念和伦理行为上变得更加紊乱无序、随心所欲,导致人类伦理环境的日益恶化。事实表明,网络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为突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集中表现为:侵犯个人隐私权、侵犯知识产权、制造信息污染、威胁信息安全、信息欺诈与信用危机、数字鸿沟、国家信息主权受到威胁以及网络信息活动中的利害冲突等等。^[3]

道德是一个价值判断系统,它与人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如果说传统的印刷文化促成“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成,那么网络文化的兴起则促成了“网络伦理”的诞生。网络伦理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网络出现之后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环境的演进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冲突的加剧,网络伦理在发达国家受到了高度重视。网络伦理研究方面的学术论著、专门的研究机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网络伦理教育以及相关的职业伦理规范的制定等都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和发展。一般认为,网络伦理主要研究网络中的伦理问题、网络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以及如何规范网络人员的观念和和行为方式等。^[4]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网络文化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文化理论家G·斯汀纳在《蓝须绅士的城堡》中曾对“后现代文化”进行批判,认为这种文化一定会导致三种恶果:丧失地理社会中心的优越感,乌托邦价值的衰败和人道主义道德观念的式微。^[5]这些也恰恰是网络文化伦理问题的表现或其结果。

2 伦理观念的大众化:精英的式微与大众的狂欢

网络文化的土壤是大众的,因此网络文化的伦理观念也必然是大众化的。这种伦理观念源于网络文化的4个内在要素。

(1) 数字图像。20世纪80年代,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詹姆逊指出,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超越文字的世界,人的生活到了这个阶段已经迈进到阅读和书写以后的全新境界了;一切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等,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7]需要指出的是,与影视文化的模拟形象不同,网络文化更加强调了数字图像的嵌入和统一。

(2) 感觉主义。网络文化是一场真正的感觉革命。从内容上看,网络文化的主导形式不再是传统的小说文本或纯粹的影视歌舞,而是各类数字资源的综合。人们不需要在厚厚的古典小说或特定的频道中去寻找故事的发展脉络和人生的悲欢离合,只要轻轻按动鼠标,马上就可以从刺激眼球的信号中了解故事情节与人物角色。从形式上看,网络空间所提供的信息界面,旨在全力开发和调动人们的全部感官知觉系统,以感官诱因的仿真来实现感官实在的真实,使主体处于极度的感官开发与敏感的状态之下。网络文化是一种多媒体文化,是一种以“看”为主的审美文化。“人们只是用眼睛生活着,放弃了思考。”^[8]

(3) 平等法则。在一定意义上讲,传播方式的单一性、范围的局限性、文字的垄断性等决定了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精英式的和反大众的。网络文化则以其特有的“权威”将所有的事物,如时尚、消费品等都吸引到自己的视力范围,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变化,从而使所有到目前为止的其他权威都走向衰亡。一方面,网络媒介具有平等主义的推动力,通过复制使得知识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原来深藏不露的阳春白雪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下里巴人的面前,从而推动了人类知识的普及,提高了社会的知识化水平;另一方面,网络文化运动蕴含着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即对传统文化的主体主义传统的批判,对终极价值目标的存疑,对僵硬的精英/平民、高雅/通俗二元对立的消解。这样,各个阶层的人们就具有了更大的语言交流的可能。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统一起来,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9]而现代网络作为迅速崛起的大众传媒形式,较之电影、电视、广播和报纸具有更强大的包容

力和普适性。

(4) 快乐哲学。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理想和榜样,需要长久培育出来的传统文化拥有的自律理性与社会批判意识。但实际上,网络文化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娱乐就是艺术,这似乎是现代文化的宣言。于是乎,网络文化不再提供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深度价值和意义,“如果 Internet 有一英里宽的话,那么它只有一英寸深”。一些网民更是通过“恶搞”等形式有意无意地拒斥和消除传媒的道德意义;各种链接也完全成了一大堆广告符号或代码的任意组合或游戏,导致“意义为零度”的信息泛滥。詹姆逊指出,如果说崇高是属于现代的话,那么后现代则是一种美的回归,不过,这里美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中的文化消费和放纵。^[10] 鲍德里亚也指出,由于信息泛滥导致大众意愿和欲望的“不确定性”,他们常常不知道如何采取行动;面对强大的技术媒体所制造出来的视觉暴力,大众态度只能是某种悲观式的调侃、游戏或“沉默”。^[11]

由此看来,伦理观念的大众化成为网络文化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不难得到理解。从技术属性和内容生产机制而言,那些具有领导意识和控制能力的媒体机构不复存在,社会大众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个人主页、BBS、博客等工具让“网上一代”获得了更多接触信息的能力;各种可以随时展开谈话的聊天工具,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模式。这些无等级性、宣泄性与颠覆性的数字化生存方式自然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并对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削弱与破坏作用,而且由于网络文化内容本身的娱乐性、庸俗性、时效性和空幻性,必然导致人们摒弃形而上的超验思考、心灵净化的深度审美体验,丧失稳定而持久的道德信仰,这又使网络文化失去凝聚力,从而成为现代社会媒介、信息与传统道德律令偏离的根源所在。^[12]

3 伦理实践的商业化: 伦理与经济的边界日趋模糊

从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欧美等发达国家完全进入到一个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商品进入一切领域,并催生出一系列遵循商品逻辑的新型文化产业。特别是在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电子文化产业中,文化突破传统的界域而被彻底地商品化,文化与经济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由此导致人们在网络文化的生产、交流和消费等实践上的全面商业化。

(1) 网络文化的生产。网络文化的生产内容不再局限于印刷时代的知识生产,而是扩展到了整个社会领域的信息生产;生产方式也从笔的创作变成了通过技术和市场法则进行的工

业化、大批量的制造。后现代之父利奥塔指出,在当今时代,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东西,否则就会遭到摒弃。^[13] 从另一个角度看,彻底的市场经济对网络文化的渗透必然导致某些文化产品生产者价值观的扭曲,将追求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作为唯一目的,由此导致创作、出版上的粗制滥造,带来大量的文化垃圾和伦理问题。在网络上无孔不入的“插件广告”就是明证。

(2) 网络文化的交流。与纸质印刷品相比,网络文化产品具有更便捷的交流方式,更广泛的交流空间,网络本身就是电子文化存贮与交流的最好载体。在跨文化、跨国际的文化交流中,网络文化产品常常可以打破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限制,进行跨文化、跨国际的传播;网络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知识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在知识精英与普通公众之间进行交流。尽管在网络文化交流中信息的贫富差距、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数字鸿沟以及跨界数据流等问题比较突出,但总体上还是按照市场的法则与商业的运作在不断地调整中。

(3) 网络文化的消费。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社会中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和抑制冲动的价值体系,花钱和享受、炫耀和时尚成了社会成功的标志。“消费主义文化不但制造出人们的欲望,同时也将这些欲望道德化和制度化。”^[14] 特别是在一个以网络文化为背景的消费社会里,人们的消费活动更多的是在信息层面而非物质层面上,文化生产服务消费需求成为铁律。

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植根于市场的土壤,并得益于商业运作。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伦理基础,这种伦理主要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产权观念、契约精神、诚信交易理念以及勤俭敬业的工作态度为支柱的,但人类的伦理却不能完全以市场运作与商业机制为完全的法则。^[15] 令人遗憾的是,在网络文化环境中,商业化运作、快餐化消费已成为当代文化实践的本质特征,而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成为人们生活的目的和生活内容的具体显现,成为一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对现代网络世界的价值观就提出批评:“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16] 网络文化的伦理问题也由此产生。

4 伦理主体的虚拟化: 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网络文化首次给人类提供了两种基本的生存空间: 物质空间是基于地缘的、物质的及其观念的种种限定,人们都熟悉

并生活其中的实实在在的现代社会;网络空间则是基于认同的、以“数字化”、“非物质化”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流的虚拟社会。在物质空间中,主体尤其被近代哲学和科学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的特权;在网络空间中,主体则蜕变为一个没有任何身份,与现实无关的、失去了透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游荡式的符号。随着信息技术的扩张与渗透,虚拟的网络空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威,而传统的文化主体却变得越来越孱弱无力、若隐若现。

波斯特使用“信息方式”这一术语,阐述电子书写和互联网对人们现实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他指出,电子书写与互联网的崛起造就了大批“网虫”,并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虚拟社会。“在信息方式中主体不再固定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上,不再拥有一个物理的、确定的、能够以理性估测其利弊得失的制高点。”^[17]网上信息的多样性、奇特性、丰富性又使人们目不暇接、真假难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接受,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主体身份的确认与构建,突出表现为去中心化、去稳定化、非个性化的特征。“信息方式把主体重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地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18]

看重当代文化存在的虚无和模拟,远离实体和现实,也是鲍德里亚等后现代学者思想学说的一大特色。鲍德里亚甚至认为,文化仿真并不是对真实的仿照,模拟也不是对真实的模仿;相反,真实倒是由仿真与模拟构造出来的,在模拟的背后并不存在什么“现实”或“真实”。换言之,模拟就是现实,仿真就是真实,除此之外,不再有超越它们的另外一个真实世界。^[19]在网络文化营造的世界中,主体与客体、表征与实在、图像与真实等界限变得日益模糊,最后完全消失在影像和符号的迷雾之中。

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任何内容都在现实存在和主体思想中得到映射,都在真实理想或现实框架下得到塑造。尽管伦理观念是看不见的,但伦理主体却是实在的。而网络技术所制造的超现实文化景观则大异其趣。数字语言和网络节点代替了以物质和能量为基础的生存模式,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种行为都被虚拟成二进制的数字符号系统,这就是真实主体的迷失与虚拟主体的产生。换言之,主体必须先变成符号然后再相互作用,主体与他人的存在只是一种符号性的存在。不仅人们的伦理行为被符号化,连人们的伦理观念也被符号化了,伦理观念成为和伦理行为一样的实在的系统,它是看得见的、可重复的。由此造就了伦理主体也只能是一种虚拟的符号。传统伦理主体的被剥夺必然造成伦理的情感伤害、焦虑、沉迷、沉默或反抗,并使得传统伦理从固定的语域转移到开放

而不确定性的语域,从电影、广播到电视一步步促使伦理主体的烟消云散,而到了网络空间,主体已彻底地成为一个虚化了的肉身,只是一个符号式的存在;网络空间类似于德勒兹的“游牧空间”,网络空间的在场也只是一种虚拟的在场。^[20]

伦理主体的虚拟化造成的伦理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人们之间主要是以“符号”方式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可视性的、亲和性的、面对面的现实依存关系被弱化,从而导致人际距离的疏远,现实道德责任的淡漠。其次,由于数字化生存的最大特点在于人们不必以真实的面目出现,人们是戴着各种面具在网络空间表演的,不受国家、民族、社会制度的限制,这样一来,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就极易成为人们情感释放的舞台,逃避现实的场所以及人格虚伪的滥觞。现实社会中的是非感、责任感、荣辱感、尊严感等被抛到一个虚空地带,交往主体的道德意识失去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网络空间是一种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虚拟社群瓦解了现实生活中实在群体或组织的身份认同及其坚信的基本原则,并将其真正的碎片化,社会个体如果长期生活于其中,必然造成人际交往的心理障碍,影响个体的精神、人格的健康发展和正常的社会化进程。^[21]

5 伦理意识的双重化:差异与统一的伦理走向

网络文化运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人类文化模式的选择过程。在网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民族伦理与统一的普世伦理这一双重意识肯定会出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斗争的“博弈”。

首先,网络文化的伦理意识是开放的、多元的。现代网络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人们交往空间的扩大。在全球时代,人们开始以全球范围的事物作为参照来反观自我的伦理行为和价值判断。麦克鲁汉指出,印刷文化最初助长了民族主义,并把这种民族主义推到极点,并使之保持下去;而包括摄影、电影等在内的电子文化的吸引力则完全是国际性的。电子媒介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和偏见,使人类“重新部落化”。^[22]在网络世界,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例如,网络的开放性、兼容性、弱控制性就极易突破现实社会行为所具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互动特征,打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疆界;网络上的一切都在迅速变动,信息的时效性强化了时空的相对意义;信息的普遍性与共享性等也会在客观上推动各国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信息网络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某些文化特征。

其次,网络文化运动又是在多元差异的背景下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温床。20世纪后期,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与此相应,人们的

生活方式、游戏规则也开始潜移默化地走向趋同。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或者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及援助项目,或者利用手中掌握的信息发布权、信息访问权、信息传播权和信息安全权等特有的网络控制权力,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的文化渗透,迫使这些国家认同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国家的复兴,也不得不开始接纳或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某些政治、文化理念。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学术话语、产业形态、艺术领域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左右。这些都势必导致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伦理观念大行其道,并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潮流背道而驰。^[23]

最后,网络文化需要人们自觉地建构全球统一的伦理法则。随着网络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当代最具生命力、最具优势的文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不是某种狭隘的地缘文化,而是着眼于全人类并且高度综合的类文化。同样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与文化交往中除了自觉保持自己本国和本民族的传统伦理之外,还应当不断寻求、整合并遵循某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伦理或“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伦理”,诸如公平、诚信、责任等“底线道德”观念。^[24]这样一来,带有类文化特征的现代网络似乎能够为包含某些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的人类文化伦理建设搭建一个平台。这恰恰有助于为民族文化伦理的多样性和世界文化伦理的统一性提供一个良性的发展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社会性问题,仅仅表达学术观点是不够的。在传统道德渐行渐远,而新的网络伦理又是“雾里看花”的时期,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全面认识网络文化的伦理特征,科学汲取传统文化的伦理优点,改善网络文化日益恶化的伦理环境;加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发掘,本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积极探讨新型的网络伦理建设;系统探讨网络文化的伦理规范,全面研究网络伦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加强文化主体的精神自律,强化“网上一代”以及新型媒介的道德教育;^[25]既要重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传统文化机构的发展,也要认真关注各类新兴的网络文化机构的建设。

参考文献:

- [1] 贺德方.数字时代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从信息服务走向知识服务[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 [2] 谢龙新.赛博空间、鲍德里亚和后现代主义文学[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5(6).
- [3] 沙勇忠.信息伦理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45-59.
- [4] 柳胜国.对网络伦理学研究的思考[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5).
- [5] 胡继华.神话与虚无之间的价值追寻[J].福建论坛,2003,(2).
- [6]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156.
- [7][8] 詹姆逊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279.
- [9][11] 孔明安.从媒体的象征交换到游戏的大众[J].南京大学学报,2004(2).
- [10] 胡亚敏.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再探[J].国外文学,2002,(4).
- [12] 赵勇.印刷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为什么阿多诺要批判文化工业[J].天津社会科学,2003(5).
- [13]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
- [14] Leslie Sklair.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M]. Harvester-Wheatsheaf, 1991:75-77.
- [15] 顾宝炎,刘有贵.市场制度与文化伦理[J].学术研究,2000(11).
- [16]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0.
- [17] M·波斯特.信息方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4.
- [18] M·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5.
- [19] 戴阿宝.鲍德里亚媒体理论的若干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2004(2).
- [20] 张法.德勒兹与思想重构[J].天津社会科学,2001(5).
- [21] 刘俊英,刘平.网络伦理难题与传统伦理资源的整合[J].烟台大学学报,2004(1).
- [22] 麦克鲁汉著;周宪译.视听新媒介的文化意蕴[J].国外社会科学,1994(1).
- [23] 王怀诗.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起源、表现及其伦理后果[J].图书与情报,2006(6).
- [24] 吕耀怀.论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伦理[J].现代国际关系,2002(12).
- [25] 李琨.媒介素质教育与中国[J].新华文摘,2004(2).

作者简介:王怀诗(1965-),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胡文静(1983-),女,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情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